

The Formation and Disillusionment of Colonial Modernity
Subject: A Further Discussion on “A Town with Papaya
Trees”

Chi-Chun HUANG

殖民現代性主體的生成與破滅：
再論〈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黃琪椿

感謝匿名評審的批評與建議，使觀念脈絡越發清晰；力有未逮之處，期待他日具備更多相關知識準備後，能予以補足。

黃琪椿，華僑大學文學院講師

電子信箱：flyingcat029@126.com

摘要

知識分子問題一向為龍瑛宗所關心的命題，過往研究亦多注意到其筆下知識分子已經不同於過往，為新的主體狀態。本文通過西方與日本的精神史脈絡，重新詮釋龍瑛宗創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前後的精神狀態，探討龍瑛宗所塑造的新主體的意涵。本文研究指出龍瑛宗塑造了從殖民地資本主義產生新的現代性個人主體，這個新的現代性個人主體具有「經濟個人主義」特質，深信個人是自身與能力的所有者，憑藉個人努力就可以獲得利益且向上發展。不過，在殖民地環境下，這個新的現代性個人主體甫出場就帶著破滅的印記。本研究更進一步指出龍瑛宗深刻揭示了日本在臺推動的資本主義的性格，以及被殖民的臺灣人僅能分得殘渣利益的幻影。

關鍵詞：日殖時期、殖民現代性、自我

Abstract

The issue of intellectuals has always been the topic that Long Ying-Zong is concerned about. Past studies have also noted that the intellectuals he write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and are the new subject state. Through the spiritual history of the west and Japan, this paper re-interprets the mental state before and after Long Ying-Zong's creation "A Town with Papaya Trees", and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 of the new subject shaped by Long Ying-Zong.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Long Ying-Zong has shaped a new modern individual subject generated from colonial capitalism. This new modern individual subjec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individualism" and believes that individuals are the owners of themselves and their abilities and can gain benefits and develop upward with their own efforts. However, in the colonial environment, this new modern individual subject appeared with a broken mark. This study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Long reveals deeply the character of Japanese-driven capitalism in Taiwan and the illusion that the colonized Taiwanese can only get a residual benefit.

Keywords: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Modernity, Subject

前言

龍瑛宗(1911-1999)在第一篇作品〈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裡創造了陳有三、戴秋湖、洪天送、蘇德芳、林杏南與廖清炎等不同類型的小知識分子，讓他們喋喋不休地敘說著他們的處境與慾望。之後，龍瑛宗持續創造不同類型的小知識分子，更讓他們兩兩成對出現，如〈朝霞〉的伊章與宏堂，〈宵月〉的彭英坤與「我」，〈黃家〉裡的若麗與若彰，〈午前懸崖〉的「我」與張石濤，以及〈獏〉裡的「我」與徐青松。這種近乎執拗地書寫不同類型的小知識分子的傾向，突顯了小知識分子問題在龍瑛宗創作裡的核心位置。歷來評論家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多半集中在小知識分子的形象（呂正惠 2002：17－29）、出路(ibid.)、類型（山田敬三 1994）與認同（羅成純 1984：233－326）問題上。先行研究對於把握理解龍瑛宗創作，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但也存在著侷限。

首先，在先行研究裡，小知識分子是不證自明的先驗性存在，橫空出世便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無須探問產生的根由與由此形成的特質，彷彿超越了時間與空間，有著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形象。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2000: 2)指出，所有知識分子都是因應某種社會職能，「歷史地」形成的，隨著社會的發展，階級力量出現變化，社會內部出現傳統知識分子與有機知識分子兩種分野，不同社會隨著發展過程的不同，知識分子的構成與特質也隨之不同。因此，必須進一步追問的是殖民地社會所產生的有機知識分子具有甚麼樣的特質？

其次，先行研究者也注意到，同樣都是由殖民教育政策所決定、接受日本移植的資本主義思想的有機知識分子，龍瑛宗已經不同於1920年代的有機知識分子（葉石濤 1981：30）。我們該如何理解此種差異？論者也指出，龍瑛宗筆下的陳有三具有「現代精神」（羅成純 1994：251），是「思考複雜的現代人」（葉石濤 1981：30），龍瑛宗自身亦具有「較濃的現代意識」（王耀輝 1991：576）。這種與1920年代知識分子間的

「差異」與「現代」之間有著甚麼樣的關係？凡此種種，僅僅依賴龍瑛宗個性的蒼白與懦弱的個人性解釋，其實無法真實地理解與把握此種差異的意義。因此，爲了更好地理解龍瑛宗所塑造的小知識分子群體的意義，必須重新回到〈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創作時的文化、社會與精神脈絡，才得以獲得新的理解與把握。

一、形式的意義與不安的精神

從〈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文本內部的主題、情節結構與人物形象出發關於小知識分子問題的詮釋，已經成爲了普遍性理解，很難有效打開新的思路，不過龍瑛宗同時代的評論者土曜人關於形式的聯想，提供了另一個思考的進路。土曜人比較了1936年下半年芥川文學獎得獎作——石川淳(1899-1987)的〈普賢〉、富澤有爲男(1902-1970)的〈地中海〉以及〈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他批評〈普賢〉的文體是流行的饒舌說故事腔，類似高見順(1907-1965)和宇野浩二(1891-1961)的文體，是當時文壇的縮影，相比之下〈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則是「既樸素又有現實感」（土曜人2006：278）。這個比較連結了〈植〉文與日本文壇的關聯。〈普賢〉的特色是以主人公「我」（わたし）作爲敘述者、絮絮叨叨說故事的饒舌體以及以頹廢爲主題。這樣的特色體現了昭和十年代¹「新人」文學的特質。根據松本和也(2011: 89-110)的研究，日本的「純文學」經過多年的衰退，在昭和八年(1933)左右出現「文藝復興」的呼聲，伴隨著《文學界》、《文藝》等文學雜誌的創刊，以及芥川獎和直木獎的設置，因應媒體的需要，文壇出現期待超越既成流派的「新人」的呼聲。昭和十年前後（1935年前後）日本文壇出現一批「新人」作家，他們共通的主題包含下列幾項：（一）新奇的題材，如朝鮮、夏威夷等外地；（二）方言的使用以及從外地看來是故鄉的日本；（三）不安定的男女關係；（四）因戀愛緣故走入人生死

1 昭和十年代指1935至1945。

胡同而死（自殺或殉情）；（五）以借錢與籌錢等貧窮問題為中心，金錢成為情節要點；（六）自我的不安與自意識過剩；（七）作為風格的饒舌體；（八）關於文學與書寫的思索與躊躇。形式上，作為風格的喋喋不休的饒舌體，經常招致文章混亂、內容薄弱、情節缺乏的批評。

形式從來不僅僅是文學技巧的實驗而已，而是反映了創作時的精神與思想狀態。如前所述，進入1930年代，日本捲入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日本企圖利用海外擴張政策以解決困局。一方面因為對外發動戰爭，軍需工業的擴大，經濟上獲得一時的安定，另一方面則強力鎮壓工農運動和日本共產黨。隨著左翼運動潰滅，普羅文學退潮而來的敗北感與挫折感，以及對法西斯主義化的危機感，導致知識分子間瀰漫著強烈的「不安感」與「危機意識」。1934年河上徹太郎(1902-1980)與阿部六郎(1904-1957)共同翻譯的舍斯托夫(Lev Isaakovich Shestov, 1866-1938)《悲劇哲學》(*Dostoevsky and Nietzsche: The Philosophy of Tragedy*)出版，獲得很大反響。知識分子的心境因為舍斯托夫的流行而表面化，三木清(1897-1945)則將這種內在心境置放於「對於『不安』的自我關注」的延長線上，稱之為「舍斯托夫的不安」（曾根博義 1990：336）。

在這種「不安」的氣息裡，文學創作也出現了變化。日本左翼運動遭鎮壓出現大批的「轉向文學」，例如濱田隼雄(1919-1973)曾經提及閱讀〈植〉文聯想到的島木健作(1903-1945)的〈癩〉，便是代表作之一（秦伸彌 1937）。轉向文學作品大多表現轉向者雖相信共產主義的正當性卻違背良心在政治與思想上敗退，在與非轉向者對比下，暴露出自我的軟弱與羞恥，是苦澀的自我檢證（平岡敏夫、東鄉客美 1987：168）。轉向文學表現了當知識分子失去精神根據時，只能在自己鬱悶的孤獨中尋找倫理的支持。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昭和十年代的「新人」小說中。奧野健男(1999: 144-145)指出，昭和十年代的「新人」作家，雖然不一定擁有與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直接相關的體驗，但是通過左翼的挫折與轉向所暴露出來的人的軟弱與醜惡、對政治的絕望、對包含自己在內的知識分子的澈底

不信任、自我的解體與罪的意識，成為他們文學的出發點。從轉向文學與「新人」小說創作表現來看，「凝視自我」應該是內在於昭和十年代文學的核心議題。雖然昭和十年代文學對於自我的凝視，採用的是相通於「私小說」的告白形式，但這個「自我」已經不同於大正時期「私小說」的那種為了建立確信的自我，而是不再確信、瀕臨解體自我形態。正因為如此，昭和十年代的文學往往充滿著混亂、死亡與絕望，帶著濃重頹廢的色彩。總的來說，懷抱著不安的精神，凝視解體自我尋求克服的方式，應該是昭和十年代文學與知識的主要感覺。

川崎浹(1993: 55-56)指出，舍斯托夫之所以在1930年代中期風行於日本，恰恰反映了日本左翼運動遭鎮壓後，無論是共產主義同路人和反共產主義者，轉向或非轉向者之間共通的喪失理念、理想與意識形態，陷入不信任政治、不安與虛無的精神狀態。這股不安的思潮雖發生在日本壇，但不意味著臺灣能免於風潮之外。臺灣作為日本殖民地，無論是政治或文化氛圍都無法孤立於日本之外。日本左翼運動遭受鎮壓的同時，臺灣的左翼運動亦於1931年遭受鎮壓，換言之，殖民地臺灣與殖民宗主國日本共享了因日本帝國主義擴張與法西斯化過程中出現的政治鎮壓以及因之而來的理想與理念喪失的不安感。同時，日本出版的書籍與刊物在「帝國」範圍內的流通，也讓殖民地臺灣的知識分子與日本的知識分子共享了同樣的知識感覺與文化氛圍。1935年臺灣的文藝刊物上即可看到舍斯托夫的影響。SK生（陳紹馨，1906—1966）批評《臺灣文藝》創刊號上邱耿光以寂寞為文學動機的說法，乃是和正在流行的舍斯托夫的「虛無」以及形成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哲學基調的「關懷」(sorge)一脈相承，「不安或虛無思想特別會侵襲近代的知識階級，成為各種體系和創作的動機，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SK生 1934 [2006]：120）。光明靜夫也指出，1935年前後，新進作家多熱衷於喬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紀德(André Gide, 1869-1951)等作家（光明靜夫 1935 [2006]：143），這些作家早被譯介到日本，之所以在1930年代

廣泛流行，也是不安的反映（三木清 1971 [1933] : 9）。郭天留（劉捷，1911—2004）也提及閱讀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 1822-1881)或舍斯托夫，並不是爲了冀求永久的絕望（郭天留 2006 [1935] : 243）。楊達(1906-1985)也注意到虛無主義正從日文壇本一點一滴傳過來，但卻少爲人提起（楊達 2006 [1935] : 290）。文學領域之外，也可看到楊杏庭(1909-1987)撰寫〈無限否定與創造性〉探討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海德格與舍斯托夫的思想（楊杏庭 1935 : 1）。種種跡象顯示，1935年前後舍斯托夫的不安同樣也在臺灣文壇與知識分子間流布。²最能體現這種不安感的，當屬龍瑛宗。

昭和十年前後，正好是龍瑛宗文學生命的醞釀與養成時期，他回憶進入臺灣商工後在課堂上知道了菊池寬(1888-1948)、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與吉田絃二郎(1886-1956)等成名作家的名字，課餘時間經常到新高堂、杉田書店翻閱《改造》、《中央公論》等雜誌，從南投調回臺北後，除了趁「圓本」熱潮的便利，購買了《明治大正文學全集》、《現代日本文學全集》、《世界文學全集》和《世界大思想全集》等套書（龍瑛宗 2006b : 138—140）之外，也經常購買綜合雜誌《中央公論》、《改造》和文學雜誌《新潮》、《文藝》等舊雜誌（龍瑛宗 2006c : 173）。從他的藏書目錄來看，不少關於小林秀雄(1902-1983)、三木清、島木健作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書籍。小林秀雄與三木清，分別是昭和十年代重要文學批評家與思想家，分別針對「舍斯托夫的不安」發表過看法；島木健作則是昭和十年代著名的轉向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全集的翻譯出版以及研究，更是舍斯托夫《悲劇的哲學》翻譯出版後引起的熱潮（松本昌子 1982 : 135—136）。這些線索顯示，通過閱讀，「舍斯托夫的不安」不僅攫住了

2 過去關於1930年代臺灣文壇與文學的研究多半孤立臺灣的範圍內討論，鮮少從「帝國」領域內的知識文化知識傳播與流通的角度關注思考臺灣文壇與文學的發展，以1930年代臺灣文學爲例，論者多半注意到左翼運動挫敗後，知識分子轉進文學，文藝活動與創作簇出，被視爲台灣文學的成熟期。可是咸少注意從政治轉向文學在知識分子的精神層面意味著甚麼？對於台灣的文化與思想又意味著甚麼？本論文嘗試從這一角度切入重新思考。

龍瑛宗的關注，更化為養分，餵養了他的文學生命。³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是「舍斯托夫的不安」與作者生命經歷餵養下的結果。從內容來看，〈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以陳有三為中心，統攝了外地書寫、金錢問題、戀愛問題等主題，並以林杏南長子懷抱理想而死映照陳有三自己的頹廢墮落，共通於昭和十年前後的知識分子的不安與理想的失落等文學主題。就形式而言，結構鬆散、對話冗長、內心描寫等特點，與和昭和十年代的「新人」小說特質有相當的重疊。土曜人認為龍瑛宗相當程度意識到小說的構成這一點，有其道理；所謂「小說的構成」不僅僅是人物、情節、結構等因素，更指向整合這些因素的背後的認識問題，換言之，龍瑛宗通過文學（內容與形式）予以呈現的，是他清楚認識到在渾迷與妥協時代中自我的解體，這才是龍瑛宗真正想追問的問題。

二、西方的「我」與亞洲的「我」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通過中學校畢業知識分子的出路問題，凝視與追問「自我的解體」，那麼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龍瑛宗小說裡所塑造的是甚麼樣的「自我」？西方在17世紀以前通行的世界觀是把人的存在按照一定的等級秩序聯繫在一起，構成一個整體。17世紀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社會分類所依賴的實體不再是家庭、教會、行會、教區等集體單位，而是能獨立負責其所扮演的經濟、社會、政治和宗教角色的「個人」。哲學方面，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我思故我在」以及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重視個人知覺和經驗的學說，都是將真理的追求視為完全是個人的事。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將政治理論和道德理論建立在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心理基礎上。宗教方面，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等的宗教改革，主張作為人與上帝調解者的教會

3 關於龍瑛宗與日本昭和十年代文學的關係，詳見黃琪椿(2017: 81-90)。

原則，應被強調上帝讓人為自己的精神命運負責的觀念所取代(Watt 1992 [1957]: 5-6, 62-64)。「個人」成為西方最重要的觀念。「個人」觀念的出現觸發了以當代社會環境中特殊個人為中心、重視個人經驗的早期小說的出現，如英國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所創作的《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 1719)，主人公魯賓遜·克魯梭便是展現個人能力（尤其是作為「經濟人」⁴的能力）與追求獨立自主的「個人」典型。此後「個人」遂成為現代小說的主要問題意識和藝術手法關注核心（黃梅 2015：6）。

如果說西方「個人」的出現是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發展與宗教改革的結果，是內在於西方社會歷史發展脈絡；那麼在亞洲，「個人」的出現則是西方勢力進逼下的結果。內田義彥(1968: 50)指出，日本明治青年關於「我」的自覺，難以脫離國家獨立意識。如同封建時代獨立的基礎是刀劍，郡縣時代獨立的基礎是貨幣，明治時期的「獨立」則是個人獨立的同時意味著國家的獨立。毋寧是以國家的獨立為目的，「我」的獨立則是國家獨立的前提，因而「我」的自覺同時是以國家的一員作為「我」的自覺。蘇敏逸(2007: 4)同樣認為中國「個人」概念的傳入，主要將對「個人」的重視、對「個性解放」的追求，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環，用來對抗、打破傳統封建思想觀念，以促成中國的現代化，解決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危殆的國家局勢，因此個人的生命價值是和中國的國家前提綑綁在一起。

在臺灣，「個人」的概念則是迫於日本國旗的到來而出現。1920年代，受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思潮、社會主義思潮與日本國內民本主義風潮以及中國辛亥革命、朝鮮三一運動激發，以留學東京的臺灣知識青年為嚆矢，發起反殖民運動。除了推動撤廢六三法運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外，影響最深的是文化運動的推動。1920年代的文化運動主要由《臺灣青年》（後改名《臺灣》、《臺灣民報》）與臺灣文化協會所推動，以

4 經濟人的特質表現為追求金錢、擅簿記、重契約，一切以利益為前提(Watt 1992[1957]: 65-73)。

文化啓蒙爲主，希望能醫治臺灣人「知識的營養不良症」，透過發行刊物（《會報》、《臺灣民報》），設置閱報處，舉辦各種演講會、電影欣賞會、戲劇活動，介紹自由民主、世界思潮等新知，除了促進民衆的政治覺醒，同時也宣導衛生思想、打破迷信陋習、探討婚姻問題等社會改造問題（葉榮鐘 2000：327－352）。作爲文化啓蒙運動思想意識中核的正是「自我意識」的覺醒：

往昔中世在沉眠於暗黑之代，文藝復興之光現於伊大利，近世之文化以明，而個人之脫離羈束也亦自此始。[……]因科學進步，而知人力之偉大。大叫解放思想及尊重人生之意義所謂人文主義者出，於是論[sic.]落之個人勃然覺醒，各自闡明個性之義而運其力。更逢佛蘭西之大革命，舉世自由平等之聲不絕，[……]故在東洋被侮之個人，亦漸明人格之概念，苟有自我意識者莫不爲倫理主義（人格主義）勃然而興。彼之唱廢種族的、階級的、及性的（男女兩性間）之差別者，亦以自我意識爲中心而活動者也。代言之，及自己之所思或自己之行動，總欲以自己爲主體。（陳崑樹 1925：22）

陳崑樹這段話典型反映了1920年代臺灣新知識分子以西方歷史文化發展的結果做爲領路提燈，視「個人」意識的覺醒爲歷史發展的必然歸趨，並以之作爲喚醒群衆自覺的理論依據。正如追風（謝春木，1902－1969）〈她要往何處去〉透過毅然解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約的女學校學生桂花所言：

像現在這一刻，整個臺灣必定有幾個還在痛哭流涕的。所以率先覺悟的我們必需代替她們謀求救贖之道，這是我們的義務。已經到了我們必需爲臺灣的婦女，不，爲一般社會點燃革命烽火的時刻了⁵。必須真正地爲被虐待的臺灣婦女努力學習。（追風 1922：59）

個人的覺醒與解放是用來打破傳統、封建的社會，以謀求臺灣能掙脫殖民體制不理待遇，對個人的強調，毋寧是臺灣反殖民運動的前提。不過也正因爲如此，雖然在理論上重視個人主體與自我意識，但1920年代並未產生現代意義上的「個人意識」，更多時候是以集體的人（臺灣）出現。柄谷行人(2003[1993])考察日本現代文學的制度性性格時，指出「現代」一詞

5 粗體爲筆者所加，鍾肇政譯本未譯出，今據原文補上。

十分曖昧，在非西方國家，「現代」總是與「西洋」的概念相混。現代文學中關於「作家」、「自我」、「客觀描寫」、「文言一致」等觀念都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起源於西方所固有的「顛倒」的產物而擴散到世界各地，現代文學一旦確立，「起源」便被忘卻，使其中關於主體、自我、內在精神等成為普世性不證自明的概念。在柄谷的論述中，可以看到現代文學的出現伴隨著具有現代特質的「自我」的誕生，社會的認識機制也因此發生根本變化。柄谷認為「風景」被發現之前早已存在，但作為風景的風景的出現，必須是對周圍外部世界沒有關心的「內面的人」的出現才能發現。這個「內面的人」並不是早已存在，而是以自白的方式存在於小說中，逐漸佔據了核心地位，這是現代文學最重要的特徵。換言之，通過「風景的發現」、「內面之發現」與「自白制度」，促成了現代性主體的人的誕生。柄谷的觀點提示了重要的觀念，首先，「現代」在亞洲都不是自然而然出現的，因此甚麼是「現代」？與過去有甚麼不同？需要仔細的分析研究。其次，所謂的「現代」不意味可見的物質、制度，更重要還在於認識裝置上的不同。通過柄谷所提示的方向來看臺灣新文學⁶，可以說1920年代的臺灣新文學裡看不到「風景」、「內面」與「自白」，並未出現具有「現代」意義的個人主體，無論是女學校學生桂花（〈她要往何處去〉，1922），或者是小販秦得參（〈一桿秤子〉，1925）還是貧苦受盡日本警察壓迫的農民，都是作為集體的人（臺灣）而出現。臺灣新文學裡現代性主體的出現，必須要到1930年代以後的「感覺世界」裡尋找。

施淑(2012: 80)指出，1930年代後半，臺灣殖民政治制度的落後性和經濟結構早熟所產生的都市生活，以及臺灣知識分子既是資本主義時代有機知識分子卻又喪失對地方事務的決策與影響力的特殊的知性體質使然，使

6 柄谷行人考察的雖是日本現代文學的形成過程，不過實際觸及的是在亞洲，甚麼是「現代」的問題，在這點上仍有其啟發性意義。不過柄谷的研究也帶出新的問題，即亞洲其他國家地區，如中國大陸，如臺灣，所謂「現代」，尤其是認識裝置上是如何形成的？除了柄谷所提出的風景、內面的人與自白制度之外，是否還有其他認識裝置上的差異，這將是未來研究的課題。

得臺灣新文學轉向挖掘內心生活的感覺世界。正是在這感覺世界裡，我們看到了巫永福(1913-2008)〈首與體〉裡以「我」作為敘述者，敘述他所看到的風景：

眺望光禿的行道樹、寂寞的街頭風景。[……]通過帝國劇場前的濠溝，朝著錦町河岸的方向往日比谷走去。濠溝中的水迎著風輕蕩漣漪，可以看到水底的水草也隨著搖曳不止。

看到柳枝乾枯，深深感覺著冬日寂寞，也愈發感受冬的嚴寒。比起那冰凝的濠溝微波，高插入灰沉沉雪空的枝椏似乎將一份更刺骨的寒意直灌入人體內。我們兩人都不說話，因為彼此熟悉，沉默並不會讓我們感到難過。(巫永福 1990[1933]: 76)

如同柄谷所言，只有孤獨、對外面周遭世界不關心的內面的人才能發現「風景」的存在。除了風景之外，〈首與體〉主要的描寫不在故事與情節的推進，而在於「我」「獨自馳騁在對方一無所知的獨想世界中」與「內省的心情」。在翁鬧([1908-1936], 1990[1937]: 113-137)〈天亮前的戀愛故事〉裡，與外在世界相關的故事情節更進一步退隱，只剩下第一人稱的「我」面對不可知的「你」，絮絮叨叨敘說著「我」的愛欲、瘋狂、殘暴、想要破壞一切的慾望，詛咒人類文明退回野獸狀態的獨白。通過風景、內省與自白，一個現代性的主體在1930年代中後期於焉確立。然而正如〈天亮前戀愛故事〉裡的「我」坦承自己是「廢料」一樣，臺灣新文學裡的現代性主體，一出場就帶著破敗的印記，這個破敗的現代性主體，在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裡獲得最完整的展開。⁷

7 匿名審查委員提示除了比較龍瑛宗與臺灣1920年代知識分子的差異之外，亦應注意龍瑛宗與日本知識分子的差異問題。這是相當重要的提示，感謝審查委員提示；唯無法於本文中有效處理，謹此說明如下：

如文章所言，亞洲「個人」的出現是西方勢力進逼的結果，西方勢力在亞洲各國的滲透，隨著各個社會的不同歷史條件與因應，而有不同型態的表現。在日本，內田義彥指出日本明治青年關於「我」的自覺，難以脫離國家獨立意識，是「政治青年」，大正時期以後，則出現了向「文學青年」轉化的現象。田宮虎彥也提到，同樣是「私小說」，大正時期的「私小說」雖暴露赤裸裸的「自我」，但目的是為了建立確信的「自我」；但昭和十年代的私小說卻是不再確信、瀕臨解體的「自我」。從這兩個現象來看，日本的「個人」意識隨著社會歷史發展而有不同的變化，其意義與日本資本主義性質與社會性質密切相關。龍瑛宗和1930年代日本知識分子雖共享了「不安」的氛圍，但兩方所面對的歷史狀況不同，因此「不安」的內容也就有所不同。1930年代中期日本知識分子

三、殖民地現代性主體的特質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關於風景、獨白與內省的描寫，是太顯眼的特徵，無庸贅述；有意思的問題是，龍瑛宗筆下的現代性主體具有甚麼樣的特質？首先，〈植〉文裡的主要人物都是中學校畢業；中學校的設立是爲了日本資本主義擴張所需，因此在剛從中學校畢業的陳有三身上可以看到「所有性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⁸的特質。「所有性個人主義」是從私有財產意識派生出來，相信人本質上是自身人身與能力的所有者。在校時的陳有三，除了教科書外，讀的最多的是「修養書、偉人傳和成功立志傳」：「在那些書裡所描寫的人們全都是以貧困和卑賤之身，經過一切荊棘之路，儲蓄巨富，或成爲社會之木鐸而貢獻人類之福祉」（龍瑛宗 2006a：11）。陳有三深信通過努力，自身的能力可以轉化爲儲蓄巨富，表現了「所有性個人主義」的特質。「所有性個人主義」不是外來的觀念，而是內在於人格特質中，因此剛在洪天送奔走找到住處安頓下來的陳有三，即使境遇不理想，仍然在牆壁上寫上「精神一到，何事不成」的大字，並且掛上拿破崙像以勉勵自己，深信「靠自己的頭腦和努力能開拓自己的境遇」，勁力十足。其次，雖然不像笛福筆下的魯賓遜與羅克薩

所面臨的「不安」主要是因爲日本對外發動戰爭強力鎮壓工農運動和日本共產黨，隨著日本左翼運動潰滅，普羅文學退潮而來的敗北感與挫折感，以及對法西斯主義化的危機感，導致知識分子間瀰漫著強烈的「不安感」與「危機意識」。龍瑛宗通過閱讀感知這樣的「不安」，但他的「不安」更多來自他因爲自身從臺灣商工學校畢業後進入臺灣銀行本行工作，沒三個月卻被外派到南投分行的經歷所觸發。龍瑛宗從個人出路問題引發的不安，卻根本地觸及了殖民地現代主體的破滅問題。龍瑛宗與日本現代知識分子的比較實牽涉了日本現代知識分子性質問題；本文所要處理的問題，主要是殖民與資本主義對殖民地被殖民主體塑造的影響，因此無法在本篇文章中深入處理本島人知識分子與內地知識分子的差異，只能冀望來日得以補足此一重要問題。

- 8 原爲加拿大政治思想史學者麥克菲森(C. B. Macpherson, 1911-1987)所提出的觀念（黃梅 2015：68）。一般譯爲「佔有性個人主義」，黃梅翻譯爲「產權個人主義」。然而西方古典個人主義所指涉的範圍很廣，包過思想、點子、創意、著作、成品、產權、商品和成本簿記等等，因此譯爲「所有性個人主義」更能點出人是自身人身與能力所有者的意涵。關於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翻譯與西方古典個人主義的觀點受教於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徐振國教授，謹此致謝。

娜⁹那麼典型，但陳有三對金錢的重視、善於簿記，一切以利益為重，也是「經濟個人主義」的化身。這首先表現為對支出與收入的精打細算：

收入		二十四圓
支出	伙食費	八圓
	房租	三圓
	電燈及木炭費	一圓五十錢
	給家裡匯錢	五圓
	書籍費	三圓
	雜費	三圓五十錢
結算收支		零

(ibid.: 13)

看起來瑣碎而多餘的細節，卻是有條理地採用簡易的收益損耗的「簿記」形式，以列表方式思考問題，權衡利弊。「簿記」語言形式所表現的理性主義的思路，同樣影響了陳有三對婚姻與家庭關係的算計：

不過要結婚，還是當對方的養子較好。戶籍上如果成為內地人，在官廳工作就會有六成加薪，其他各方面也都會有利益。不，不，就算把那種功利的考慮摒棄於外，如果能和有著無與倫比的柔順和教養深厚、又美麗如花的內地人姑娘結婚，把自己的壽命縮短十年或二十年，也不會埋怨的呀。然而，這麼少的薪水，不是無可奈何的嗎？對，要用功，要努力，那才是解決境遇的一切吧。(ibid.: 12)

以利益為量尺，不僅衡量金錢，也衡量人際與社會關係，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獨有的技術特徵在社會關係上的表現。無論是「經濟個人主義」或「所有性個人主義」，都是現代資本主義發展下的個人主義特質，陳有三此前臺灣新文學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人物，不僅反映了1930年代日本資本主義在臺灣的滲透與發展，而其困窘亦反映臺灣人僅能從日本在臺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分得殘渣而已。

其次，陳有三並不完全是功利導向的個人，在他和廖清炎對話中，可

9 關於笛福筆下的魯賓遜與羅克薩娜的經濟個人主義和產權個人主義分析，見黃梅(2015: 40-87)。

以看到他對知識的重視：

也就是說生活沒有創造性。不過，我認為我們必須努力使我們的生活具創造性。

[……]

不過即使如此，假定我的第一目標在於改善自己的境遇，由於時代的潮流變成不可能，因讀書獲得知識，人格的陶冶這種第二目標是抹煞不了的。

[……]

不過，我認為唐·吉軻德助善懲惡的觀念，以及知識的本身，決不是不正確的。

[……]

我們是年輕的。我要把我的精力消耗在善的方面。(ibid.: 27-28)

陳有三認為知識的目標在於人格的陶冶，相信自我能使生活具有創造性，以及追求「善」的境界，閃現著教養主義與德國新理想主義哲學的影子。所謂教養主義指的是通過閱讀哲學、歷史、文學等人文學以達到人格的完成為目標的態度。日本教養主義起於受東京帝大講師克貝爾(Raphael von Koeber, 1848-1923)影響的夏目漱石(1867-1916)門人阿部次郎(1883-1959)與和辻哲郎(1889-1960)，通過《三太郎日記》(1918)與《善的研究》(1911)的出版而發展起來(竹內洋 2004: 40)。作為日本教養主義思想源頭的則是德國新理想主義哲學。德國新理想主義哲學即新康德哲學，指的是19世紀後半在德國發生的「回歸康德」的一連串觀念論及理想主義哲學，其中尤其是西南學派的價值哲學，嚴格區分「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把價值規定為超越的東西來論述新理想主義，為日本大正時期的文化主義、人格主義提供了基礎邏輯(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會 1992[1959]: 176)。新康德學派哲學是以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的統一國家為出發點，把顯示出飛躍發展的後進資本主義德國小資產階級世界觀與人生觀，從邏輯上加以組織化，並賦予堅強的信念和理想。大正初期的日本有著類似的社會根據與心理基礎，因而經由東京大學講壇特聘的外國教師與歐洲留學回來的井上哲次郎(1856-1944)等人引進後廣泛流行，受

影響的著名哲學家有朝永三十郎(1871-1951)、桑木嚴翼(1874-1946)、西田幾多郎(1870-1945)、田邊元(1885-1962)等(ibid.: 177-178)，三木清在東京帝國大學就學期間，亦深受新康德學派哲學影響。龍瑛宗的藏書除文學之外，尚有哲學與經濟學書籍，基本上反映了教養主義的閱讀趨向，在哲學書籍中，可以發現教養主義旗手之一桑木嚴翼的《哲學概論》(1923)，也可看到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重要著作如《形上學導論》(*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 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önnen*[1783]，桑木嚴翼、天野貞祐譯，1926)等書。顯示新康德學派哲學與教養主義對於精神與文化的重視，也構成了龍瑛宗思想的重要內容，反映在陳有三身上，則突出了在理性計算之外，重視知識、人格與善的理想主義個人主義色彩。¹⁰

四、木瓜樹——中空的殖民現代性主體

陳有三兼具「經濟個人主義」與理想主義個人主義色彩的現代性主體，卻無法像現代資本主義開端的魯賓遜或者後進資本主義德國小資產階級一樣有著鷹揚雄飛的可能性。正如矢內原忠雄(1893-1961)所言，日本資本是隨著日本國旗而來到臺灣，在臺灣資本主義化過程中，日本大資本家占了獨佔支配地位(矢內原忠雄 1987: 65)，因此像魯賓遜依靠個人的努力可以累積金錢與財富的可能性並未出現在陳有三關於未來的想像中。加上臺灣的殖民地新式教育乃配合殖民者建設臺灣資本主義的需要而設置，目的在於培養資本主義發展所需的基本技藝與知識，因此並不鼓勵被

10 除了上述《形上學導論》之外，龍瑛宗藏書中尚包括西南學派重要代表海因里希·李凱爾特(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的著作《文化科學與自然科學》(*Kulturwissenschaft und Naturwissenschaft*[1926], 1939)、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1781]，天野貞祐翻譯，1943)、《實踐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1788]，波多野精一、宮本和吉譯，1943)等書，顯示龍瑛宗對康德哲學的關注與興趣。龍瑛宗與新康德學派的關係有待日後深入挖掘。

殖民者在殖民地力爭上游，希望將臺灣人同化在日本社會的底層(Tsurumi 1999[1977]: 74)。進入社會後，官吏公務員、資本家及高級會社員、銀行員，亦是由日本人獨佔(矢內原忠雄 1987: 99)。在此情況下，陳有三對於未來的想像不自覺地只能是一種自我閹割的想像：「陳有三彷彿沒有要成爲一代風雲人物，或站在統治萬人的地位這種荒唐的想法」（龍瑛宗 2006a: 12）。由於失去對於地方事務的決策與影響力，陳有三已經無法想像成爲一代風雲人物或佔據統治地位的可能，只能想像著立志考上文官考試進入統治體制，進而花十年時間苦讀成爲律師，這是臺灣人唯一可以和日本人平起平坐的職業領域(矢內原忠雄 1987: 99)。正因爲如此，「成爲日本人」遂成爲能同時實現「經濟個人主義」與「理想主義個人主義」的唯一選項。於是陳有三的主體性不得不加上了扭曲的成分，他的「經濟個人主義」與「理想主義個人主義」必然使他鄙視與自己同族的同胞：

吝嗇、缺少教養、低俗卑劣的群體不就是他的同族嗎？即使僅僅一分錢也破口大罵，互相仇視的纏足老太婆們、平時一毛不拔，一到婚喪喜慶時居然不惜借錢大吃大喝大鬧多詐而好訴訟的人們、以及狡猾的商人，在中學畢業所謂新知識階級的陳有三眼中，這些人們就像在沒有向上發展的黯淡生活面上蔓延的卑賤雜草。¹¹(*ibid.*)

顯然「向上發達」與「教養」成爲兩把現代性量尺被用來衡量他的同族，視他們爲「卑賤雜草」，恥於與他們爲伍。同樣是出於「經濟個人主義」與「理想個人主義」的作用，他只能以「成爲日本人」爲目標，在理性計算下，上上策是成爲日本人的養子，立即可有六成加薪；中策則是娶個內地人姑娘，但這兩者都不是操之在我隨心所欲可以達到的，他只好「時常穿著和服，常用日語，心理燃燒著理想、進取之火」(*ibid.*)，或者「穿著夏季單衣笨拙地繫上兵古帶，在街上漫無目的地漫步」(*ibid.*: 26)，¹²藉以滿足「成爲日本人」的慾望，同時突顯自己不同於「擁有被石頭壓扁的雜草般生命力的人們」的優越感。只是，「笨拙地繫上兵古帶」突顯了想「成

11 對照原文，譯文略有出入，今根據原文修改。

12 原譯文無法突顯陳有三學日本人穿著的笨拙姿態，今根據原文修改。

為日本人」的扭曲。通過陳有三，龍瑛宗表現了日本資本主義的到來而出現的現代性主體，在殖民地臺灣，只能是內在地帶有「成為日本人」扭曲成分的殖民現代性主體。這個殖民現代性主體有著「向上發展」的慾望，但在殖民地環境下，這個「向上發展」的慾望被閹割，而且限制了方向，龍瑛宗極其藝術性地以「木瓜樹」象徵了這樣的主體狀態。

小說以「木瓜樹」冠題，但情節並不依賴著木瓜樹發展，倒像是南國風景般存在，不過細查木瓜樹出現的場景，似乎別有用意。木瓜樹在小說中，有兩種作用，一種是相對單純的寫景，如描寫小鎮的地理環境時，提到：

登上丘陵，透過相思樹的枝梢，俯瞰這個小鎮，在木瓜、香蕉、檳榔、榕樹等的濃綠裡，看得見黑色屋頂矮矮地趴在那裡。稍有一段距離的右邊，製糖工廠像白色城廓般被一大片甘蔗田圍繞著。(ibid.: 20)

不難看出低矮的黑色屋頂與白色城廓般製糖工廠的對比意味，木瓜樹在這裡，僅是作為客觀環境的一部份被描寫。但在其他段落，關於木瓜樹的描寫，則與陳有三們的精神狀態相關聯。第一次出現描寫木瓜樹的場景是陳有三與洪天送拜訪蘇德芳的路上，經過內地人住宅，周邊有許多的木瓜樹：「沉穩的綠色大葉子下樹幹上，纍纍成簇的長橢圓形果實，正好被夕陽抹上微微的茜色」¹³(ibid.: 6)。夕陽下，沉穩的綠色大葉，纍纍的果實，與內地人住宅的映照，隱隱透露出自得與風采的意味。與此相呼應的是黑色油臉穿著夏天單衣有著異樣風采的洪天送向陳有三述說著再忍耐幾年即可升上一定地位，住在內地人式家屋，過上內地人式得意愉快生活的夢想。第二次描寫木瓜樹則是拜訪過家計沉重，負債纍纍以至於身體瘦骨嶙峋顯得營養不良的蘇德芳後，洪天送一句「如果我們也變成那樣就完了」(ibid.: 9)，在陳有三心上留下沉鬱的陰影，洪天送帶頭向「非常寂寞、沒有行人的黑暗街道」往公園走去：

一坐在長椅上，恰如森林一般的靜寂便逼上來。長椅後面，橡樹叢生著形成強韌的黑暗。腳下的小路發白彎彎曲曲的，終於為黑

13 此處寫景文字象徵了陳有三的精神狀態，故根據原文修改譯文。

闇所吞沒。前面草坪旁邊一片木瓜樹靜靜地吸取著這時中天弦月的光芒，把薄薄的樹影投射在地上。¹⁴(ibid.: 12)

木瓜樹依然挺直向著天上延伸過去，但是周遭的陰影已然漸漸攏上來，呼應著曾經是傑出網球選手意氣風發如今陷於生活困窘衰頹狀態的蘇德芳，在陳有三與洪天送心上落下的陰影。第三次描寫木瓜樹的場景，則是廖清炎來訪，打破陳有三關於知識可以改善生活的幻想，以及林杏南傳達不應怠忽職務、放棄追求青雲之志的勸告後，陳有三感覺暴露於灰色沙漠的生活之路只能通向彼方的墓場，生活目標與意志散落，經常像野狗般走到遠離小鎮的郊外：

走在相思樹的林蔭路上，原野上散落著富裕的白牆農家和低矮搖搖欲墜的貧農土角厝。只有木瓜樹一樣欣欣向榮地高長著，伸展著手狀的大葉。樹幹上簇生著透著淡黃色的纍纍果實。這色彩美麗豐饒的南國風景使他的心平靜下來，在空洞的生活裡投射入微弱的陽光。¹⁵(ibid.: 33)

當陳有三感到宛若困在蜘蛛網中的小蟲，逐漸被敗滅的幽暗心情侵蝕的時候，欣欣向榮結實累累的木瓜樹穩定了陳有三逐漸被侵蝕的心情，讓他不至於完全墮入絕望之中。如果僅從木瓜樹所具有的豐饒和生命力支持了陳有三精神的傾頹來理解，似乎過於抽象。這個場景中木瓜樹出現的時間是陳有三到小鎮的次年二月，但關於木瓜樹往天空生長的姿態與纍纍果實的描寫與關注，與前一年九月陳有三剛到小鎮不久，拜訪蘇德芳路上出現的木瓜樹場景描寫相同，正是對木瓜樹向天生長與果實簇生的再確認，穩定了陳有三的下墜的精神。最後一次出現木瓜樹的場景，則是在小鎮生活一年後完全放棄自尊、知識、向上和反省，沉溺在酒精中的陳有三聽見林杏南長子死訊以後：

十一月末的一個黃昏，陳有三坐在公園長椅上，從略帶微黃的美麗綠色木瓜葉間，凝望著無窮深邃的青瓷色天空发呆。

這個豐饒的自然不同於以往，溫和的影子落在人心上。

14 同前註。

15 同前註。

不久，陳有三慢慢站了起來，右肩低垂，微微低著頭行走。(ibid.: 47)

木瓜樹依舊不變，但與過去不同的是，陳有三再也無法從木瓜樹的豐饒與挺直向上獲得肯定與確認從而支撐下墜的精神，離去的背影呈現了消沉低落的姿態。從這幾個段落的分析來看，木瓜樹的作用不單純是客觀的存在，而是與陳有三的主體狀態相聯繫，木瓜樹的樹型挺直向上生長，樹葉大而成掌狀，與樹幹上纍纍簇生的果實，與陳有三奮鬥向上的慾望與對於知識、教養與理想的自信，有相通之處，因此陳有三才能從觀看木瓜樹中無形獲得一種自我狀態的再確認，從而在絕望的現實中獲得生存的力量，直到陳有三對於投射在木瓜樹上的自我狀態，再也無法肯定與確認，最終在林杏南的瘋狂中看見自己未來的圖像。龍瑛宗運用近似新感覺派的藝術手法，通過感覺連結生命與現實，讓木瓜樹既是客觀對象，也是主體狀態的投射；加上木瓜樹高大挺直，但莖幹中空、根部幼細、入土淺薄的客觀特性，恰恰好點出了殖民現代性主體的特徵。

五、殖民現代性主體的破滅與頹廢

龍瑛宗不僅僅描繪了殖民現代性主體的形成與精神構造，更進一步指出，即使是這樣內含自我扭曲成分的殖民現代性主體，在1930年代中期以後的殖民地臺灣也只能走上破滅之路，毫無希望可言。如前所述，從洪天送經歷蘇德芳到林杏南，展現在陳有三眼前的是一條通向墓場的灰色沙漠般生活之路。在這過程中，陳有三的引以為傲的自我精神陸續破滅。首先是城市青年廖清炎的「知識無用論」所造成的衝擊：

做學問——就是自學勉勵創造自己的生活。可是衝破那充滿苦鬥的難關而勝利之日時，等待你的是甚麼？不過是一成不變的拮据生活的變形吧。(ibid.: 27)

[……]

知識將使你的生活不幸吧。不管你如何提高知識，當你碰上現實，也許那知識反而會成為你幸福的桎梏。(ibid.)

[……]

當知識擁抱著華麗的幻影時，會緩和一些生活的痛苦吧。可是不久幻影像會支離破碎。把喪失掉幻影的知識和生活結合在一起時，生活的痛苦只會變得更加苦楚而已。(ibid.: 28)

畢業後在都市商社工作的廖清炎，不僅意味著成功的代表，也是最能理解中學校畢業小知識分子優越感所在的人。他向陳有三傳達那代表著機會與允諾的都市生活的真相是：想通過知識改善生活境遇的想法不過是一場華麗的幻夢，當幻夢破碎，知識的追求讓人更加清楚意識現實的痛苦，反而成為幸福的桎梏。這番話毫不留情地打擊了陳有三上升之路的想像，讓他意識到黑暗的存在，開始對讀書感到疑惑。接著是黃助役一番「實用人物」論與林杏南的規勸所造成的打擊：

我認為社會不幸的原因總在於知識過剩哩。[……]所以就街役場來說，與其要找有知識的人，倒不如找個把自己全部精神傾注於職務，工作精確和字體端正秀麗的實用人物。(ibid.: 31)

黃助役所謂只需工作精確與字體秀麗的實用型人物，反映的正是日據時期的殖民體制並不樂見被殖民者努力向上，有意將殖民地人限制同化在社會底層的思維，這對渴望憑藉個人努力可以成功向上爬升的陳有三來說，無疑是幻想的再一次破滅。廖清炎的「知識無用論」與黃助役的「實用人物論」，分別從象徵成功的都市與現有體制，直接給陳有三主體精神中的「經濟個人主義」予以迎頭痛擊，使他的主體精神崩塌了一根重要支柱，因此他開始感覺說不清的憤怒，繼而是敗滅的心情侵蝕腳跟，像是被困在蜘蛛網中的蟲子一般。

第二個打擊則來自現實生活與作為人格完成、善的知識間的衝突。廖清炎以擁有音樂知識能欣賞音樂的人卻買不起電唱機和貝多芬等人的高價作品為例，指出「知識增加也有使生活更加豐富、愉悅、向上的人」，但「那只是少許特定被選擇的人」（龍瑛宗 2006a：28），不完全否定知識可以使人向善，達到人格完成的看法。但在老朽無能、唯唯諾諾、諂媚上司以避免被革職的林杏南眼裡，知識不比金錢來得重要：

決定人幸與不幸的，絕不是知識和道德，而是金錢！在金錢之前，既沒有道德，連人情、憐憫和道理都沒有。飢餓的哲學家為

了獲得食物，也許連當跑街奏樂的廣告人都在所不惜吧。不然要死嗎？[……] 這個小鎮經常諤諤談論孔子言行的老儒學先生，因為貧窮幹了騙人的勾當，手反綁在背後，被人拖著悄然而去的身姿。(ibid.: 34)

林杏南以飢餓的哲學家與儒學先生為例，指出一旦面對飢餓與貧窮，以思考人生真理為職志的哲學家可以改頭換面成為以誇大鼓吹為職志的廣告人（近似sandwich man）；平日諤諤談論禮義廉恥、君子之道的儒學家搖身一變成為追求利益不惜騙人的小人，因而得出金錢之前不存在道德、人情與憐憫的結論。這一席話有力地揭破相信知識具有陶冶人格，使人向善的力量，相信知識可以使自己有別於吝嗇、沒教養、低俗骯髒卑賤雜草般同族的陳有三的幻想，使他的主體精神另一個支柱「理想的教養主義」亦隨之崩塌。失去主體精神支柱的陳有三，開始鄙夷讀書，自暴自棄，掙扎著逐漸步入頹廢之路。

最後將陳有三推入絕望深淵的是他對林杏南女兒翠娥的愛戀遭遇了挫敗。小說中關於陳有三與翠娥的情感描寫並不多，關於翠娥，只知道是個有著「端正白嫩豐滿的側臉」、「嫵雅美麗如牡丹」的女子(ibid.:35)；除此之外，看不到兩人的互動，也缺乏情感發生的過程。但陳有三卻抱著極為濃烈的情感，並少見地採取行動拜託洪天送向林杏南提婚，遭拒絕後墮入絕望與痛苦中。兩相比較下，陳有三的情感衝動與絕望痛苦顯得突兀與不自然。不過也正是這突兀與不自然透露陳有三墮入頹廢的關鍵。

「戀愛」意識是與資本主義文化一同出現在臺灣的。1920年代初臺灣新知識分子以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為自己的領路人，追求自由平等與文明的理想社會時，引進了現代「戀愛」觀。他們通過愛倫·凱(Ellen Key, 1849-2916)與厨川白村(1880-1923)的戀愛觀（吳婉萍 2013：42），在追求解放女性與婚姻自由的社會改革脈絡下，主張「戀愛是至上的最高的道德」（張我軍 1925：12）。這個從日本經由中國再到臺灣的「戀愛」意識具有幾個特色：首先，「戀愛」是一種「現代」的、進步的象徵（溫若含 2000：12）；其次，「戀愛」具有與肉欲相區別的「高尚的精神性」

意義（清地ゆき子 2014：278）；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戀愛」意味著兩個異性的個人的結合，互相完成「做一個『人』的自己」（張我軍 1925：15），是「人」的完成的表現。

從這個角度來看陳有三與翠娥的愛情，便可理解何以翠娥作為戀愛對象其女性的形象那麼單薄，有著「含羞的沉靜眼眸」、「寂寞難受的眼眸」或是「顧忌著別人目光的眼眸」（龍瑛宗 2006：41）的翠娥接近於一種理想的存在，陳有三對她的情感狀態偏重於精神上對「美麗又崇高」理想的思慕。陳有三愛戀翠娥的意義在於通過愛戀理想存在的這一事件本身所呈現出來的「自我」存在與作為「人」的完整的證明，所以本來已經失去光和希望的陳有三重新找到活力與希望。因此當陳有三的愛情遭遇林杏南的反對時，意味著「自我」存在與作為「人」的完整性的失落。至此，支撐陳有三的最後一根支柱終於也被打掉了，殖民現代性主體終究成了破滅的主體，陳有三只能感到被黑暗完全籠罩，詠嘆「黑暗，真是黑暗啊」（*ibid.*: 44）。

龍瑛宗以精確的月份時間推進情節，描繪一年之中陳有三的生活與精神的變化，揭露一個殖民地資本主義下生成的理性且相信憑藉個人能力可以向上爬升的現代性主體，在殖民地現實中，即使是自我扭曲以成為日本人作為個人努力的目標，也沒有依照資本主義邏輯順利達成的可能；相反的，構成現代性主體精神特質的「經濟個人主義」、「理想個人主義」與「個人自我」，一步步被斷喪，最終破滅。想要雄飛的殖民現代性主體最終只能成為「緊緊抱住露骨的本能，徐徐下沉的頹廢之身，竟有極為合適的黃昏荒野存在著」（*ibid.*: 47）的破滅頹廢的主體。

龍瑛宗作為隱身的敘述者，一開始與主人公陳有三保持一定距離，而且略帶諷刺地描寫陳有三精打細算、立志向上的夢想：「然而看到在月租三圓倉庫般的土間裡，陳有三穿著和服靠在竹製臺灣床上的身姿，實在是挺滑稽的景象」¹⁶（*ibid.*: 12）。對於藉由穿著和服滿足「成為日本人」的慾望

16 譯文根據原文修改。土間：為日式傳統民家中室內空間的一部份，略與地面同高，未鋪設木板的空間。葉笛譯為土房間。

並突顯自己不同於周遭同族的優越感的陳有三扭曲的形象，龍瑛宗其實是嘲笑的。隨著情節的進展，陳有三的主體精神一步步被打掉時，龍瑛宗的敘述方式也從第三人稱不自禁滑向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例如，聽完廖清秀一番話後，陳有三原本堅固讀書求考律師的意志出現了動搖，思考著放棄讀書後的生活是要到朋友那發牢騷聊身邊瑣事還是到妓女戶擁抱女人的心理描寫，就是典型的例子。從小說技巧來看，正如三輪健太郎所批評的，從第三人稱滑向第一人稱是個缺點（三輪健太郎 2006 [1937]：304）但是從敘述者與主人公關係來看，作為敘述者的龍瑛宗，從原本客觀嘲笑地看待陳有三這個殖民現代性主體的空想與扭曲，卻在敘述殖民現代性主體精神崩解的過程中，逐漸因自身的經歷共感於陳有三的苦悶，以至於當陳有三的主體精神完全破滅時：「拋棄所有的矜持、知識、向上與內省，抓住露骨的本能、徐徐下沉的頹廢之身，恍見一片黃昏的荒野」（龍瑛宗 1994：71）。在原文裡，這個句子缺乏明確的行為主體，既是主人公陳有三，也可以是敘述者龍瑛宗，二者合而為一；龍瑛宗寫的是陳有三，但也在陳有三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因此陳有三精神的頹廢荒蕪同時也是龍瑛宗精神的頹廢與荒蕪。

結語：凝視自我解體的反身性意義

如果僅僅是頹廢與荒蕪的揭露，那是耽溺；但〈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深刻處在於由林杏南的瘋狂與林杏南長子的死亡而突顯的反身性。林杏南長子對陳有三產生衝擊，是頹廢的陳有三聽聞林杏南長子病逝與林杏南從街役場離職的消息，某日在公園裡看到「衣服破裂、頭髮蓬亂，失神的眼睛，合著滿是汙泥的雙手，跪朝天空膜拜祈禱」（龍瑛宗 2006a：48），發了瘋的林杏南以後：「陳有三想起林杏南落寞醉眼的灰白色幻像和那死去長子的話語，在黑暗洞窟一般的心上，颯地吹進一陣微寒的風，倏然，發現瑟瑟戰慄著的自己¹⁷」（ibid.: 58）。

17 原譯文未能貼近原意，今根據原文修改，底線為筆者所加。

林杏南長子公學校畢業後半工半讀通過極為艱難的檢定考試¹⁸卻罹患了肺病在家休養，由於貧窮只能通過朋友寄來的舊書和舊雜誌了解日本現象、海外思潮和中國以及朝鮮的作家。他自言讀了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1884)受到當頭棒喝，「向來的觀念搖搖晃晃地崩坍下去了」(ibid.: 42)，還希望能讀到《阿Q正傳》(1921)、高爾基(Maxim Gorky, 1868-1936)的作品和摩爾根(Lewis Morgan, 1818-1881)的《古代社會研究》(*Ancient Society*, 1877)。他告訴陳有三：

橫阻在我們眼前的黑暗絕望時代會永遠那個樣子嗎？還是我們以為烏托邦的快樂社會將會以其必然性出現呢？這只有不挾雜感傷和空想的嚴正科學思維才能給予我們明確的答案吧，也許真實的知識要解釋現象時，會把我們拖向深沉的痛苦，不過，我認為一切現象就是歷史法則顯示的姿態，是不該詛咒的。幸福沒有痛苦和努力是無法達成的吧。只是我認為我們面對這個陰鬱的社會，就要以正確的知識來看清歷史的動向，不要陷入突然的絕望和墮落，必定要正直的活下去。(ibid.)

這個閱讀恩格斯和摩爾根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集合了日據時期臺灣烏托邦社會主義到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社會主義青年（施淑 2001：270），即使生長於艱困的環境、病體孱弱、隨時面對死亡的威脅，但他仍然堅信嚴正科學思維、歷史法則以及烏托邦社會必將到來，認為務必要以「正確的知識」看清歷史的動向，避免陷入突然的絕望與墮落，必須要正直地活下去。陳有三在這個軀體蒼白單薄，但滿懷對歷史與社會的熱情，一直到死都堅持著自己的理想與信仰的社會主義青年身上看到了頹廢墮落的自己。這個結尾不禁讓人想起昭和十年代島木健作的轉向文學〈癩〉中因為咳血和拘禁的重壓而轉向的共產主義者太田，從同樣入獄、身患難以治癒癩瘋病，卻堅持不放棄昔日信念的同志太田身上，看到自己的軟弱與破敗。林杏南的發瘋彷彿向陳有三預告著末路，陳有三想起林杏南長子

18 葉笛譯為「他發現自己直打哆嗦」，但從原文脈絡來看，此處不是實體意義上陳有三自己打哆嗦，而是他從林杏南醉眼和去世長子話語中看到戰慄的自己，因此筆者根據原文修改。

的話語，並從中看到「瑟瑟戰慄著的自己」(ibid. 48)。「看見自己」不僅是看見林杏南長子話語中所謂的「正確知識」，是以嚴正科學思維與歷史法則看清歷史的動向，對比自己所擁抱的是渺小的、以改善個人境遇與陶冶人格為職志的知識，也是從林杏南長子身上，看見破敗的自我，因此感到戰慄與不安。這是〈植有木瓜樹小鎮〉的反身性意義所在。通過這個反身性，龍瑛宗清楚意識到在殖民地成長起來的現代性殖民主體的破敗，陳有三的戰慄與不安也是龍瑛宗的戰慄與不安，這是龍瑛宗絕望與不安的根源。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書寫的是知識分子已全然褪去藉由個人改造與解放以達到民族與社會解放的企圖與自我期許，成為以追求個人利益至上的「純粹」的個人，個人的慾望與野心完全不可能有獲得滿足的可能，同時卻仍是生活在憎恨又不得與之圖存的社會之中。透過將知識分子的選擇與出路對象化的敘述方式，龍瑛宗充分意識到在殖民社會中，個人主體誕生同時也是幻滅的開始，並因此陷入深刻的絕望之中。土曜人批評這篇小說是「把黑暗當作黑暗與以某種程度上肯定」，並對作者的態度不以為然。不過把「黑暗當作黑暗」正是承認黑暗的存在，這才產生了得以克服的空間。這是〈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思想意義，也是龍瑛宗文學創作的原點。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之後，龍瑛宗持續創作以知識分子為主題的作品，如〈朝霞〉(1940)、〈宵月〉(1940)與〈黃家〉(1940)等，這種近乎執拗地書寫知識分子，顯示他對主體狀態的關注。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小說共同的特徵是以兩個人物為一組，通過對話相互對照詰辯，主人公之一是懷抱著夢想最終挫敗的人物，如懷抱理想經商與從事文學終究落空的伊章（〈朝霞〉），曾經是學校裡風雲人物最後頹廢酗酒貧病而死的彭英坤（〈宵月〉），以及家貧卻極度渴望到東京學習音樂的若麗（〈黃家〉）。作為對照的另一組人物則是相對穩健、走現實道路的人物，如在鄉下經營山林的宏堂（〈朝霞〉）、生活沒有熱情庸庸碌碌過活的「我」（〈宵月〉），與熱愛繪畫卻選擇當肖像畫家、走著雖不滿意但能夠走過

去的道路的若彰（〈黃家〉）。這兩兩一組的人物，雖為對照，但並不是截然對立，正如〈宵月〉裡的「我」與彭英坤的關係有著相通性：「他那種寂寞的眼神與我之間，好像有一脈相通的心緒似的，但是這一點，到現在仍然想不清楚有甚麼關聯。」（龍瑛宗 2006：154）「我」雖蔑視憐憫彭英坤，卻也從彭英坤奇妙而寂寞的眼神中感到難以言喻的相通的心緒。〈黃家〉裡的若麗和若璋則為兄弟關係，通過兄弟間的詰問，彼此映襯的是若麗夢想無法實現後內心的荒蕪，以及若彰務實但精神枯竭的狀態。龍瑛宗進一步通過「複調小說」¹⁹的藝術形式，讓理想受挫後頹廢喪失了活氣的人和安於現實生活的人相互對話辯難，顯示了龍瑛宗企圖找出克服主體破滅方法的嘗試；²⁰這個嘗試也成了龍瑛宗日據時期創作的主軸。

綜上所述，取徑日本與西方精神史重新掌握龍瑛宗創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前後的精神狀態，發現龍瑛宗雖與日本昭和十年代知識分子一樣，深受日本文壇瀰漫的「舍斯托夫的不安」影響，然而其出身殖民地的經歷，卻與法西斯擴張過程中，日本知識分子所產生的對於理想破滅、政治不信任的不安，有著大相逕庭的內容。龍瑛宗塑造了從殖民地資本主義產生，與此前不同的、新的現代性個人主體。這個新的現代性個人主體，具備重視金錢、利益、擅長簿記、理性計算等「經濟個人主義」特質，深信個人是自身與能力的所有者，憑藉個人努力就可以獲得利益且向上發展。不過，在殖民地環境下，這個新的現代性個人主體甫出場就帶著破滅的印記，不僅完全沒有依照資本主義邏輯達成的可能，構成現代性主體精神特質的「經濟個人主義」、「理想個人主義」與「個人自我」，一步步被斷喪最終破滅。於此，龍瑛宗深刻揭示了日本在臺推動的資本主義的性格，以及被殖民的臺灣人僅能分得殘渣利益的幻影。

19 複調小說觀念來自來自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1895-1975)〈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1963)，見：Bakhtin, Mikhail (巴赫金)，白春仁、顧亞鈴譯。1998(1963)。〈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的問題〉，收錄於《詩學與訪談》，錢中文主編，白春仁、顧亞鈴等譯，頁4-22。石家莊：河北教育。

20 關於龍瑛宗企圖找出克服主體破滅方法的討論，詳見黃琪椿(2019: 14-15)。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Tsurumi, Patricia E. (派翠西亞·鶴見) 著, 林正芳譯(translated by Lin, Zheng-Fang)。1999(1977)。《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Rizhi shiqi taiwan jiaoyush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宜蘭(Yilan)：仰山文教基金會(Yangshan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Watt, Ian (伊恩·P·瓦特) 著, 高原、董紅鈞譯(translated by Gao, Yuan and Dong, Hong-Jun)。1992(1957)。《小說的興起》*Xiaoshuo de xingqi (The Rise of the Novel)*。北京(Beijing)：三聯書店(Joint Publishing)。

SK生(陳紹馨)著(Mr. SK [Chen, Shao-Xin])，涂翠花譯(translated by Tu, Cui-Hua)。2006。〈《臺灣文藝》創刊號讀後感〉“*Tai wan wenyi chuankanhao duhougan*” [Comments on the First Issue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Art*]，收錄於《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 雜誌篇》第一冊 *Rizhi shiqi taiwan wenyi pinglunji zazhi pian di yi ce [A collection of Taiwanese literary criticism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Column 1]*，黃英哲編(edited by Huang, Ying-Zhe)，頁120—124。臺南(Tainan)：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Kuojia Taiwan wenxueguan choubei chu)。

三輪健太郎著(Sanchaku, Yotaro)，王惠珍譯(translated by Wang, Hui-Zhen)。2006。〈《改造》第九屆有獎徵文發表及其得獎作品(一)〉“*Gaizao' di jiu jie youjiang zheng wen fabiao ji qi dejiang zuopin (yi)*” [‘kaizou’ the 9th prize essay publication and winning works part1]，收錄於《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 雜誌篇》第二冊 *Rizhi shiqi taiwan wenyi pinglunji zazhi pian di er ce [A collection of Taiwanese Literary Criticism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art 2]*，黃英哲編(edited by Huang, Ying-Zhe)，頁302—304。臺南(Tainan)：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Kuojia Taiwan wenxueguan choubei chu)。

土曜人著(Tu, Yao Ren)，吳豪人譯(translated by Wu, Hao-Ren)。2006。〈「普賢」、「地中海」以及「植有木瓜樹的小鎮」〉“‘Puxian’、‘dizhonghai’ yiji ‘zhi you muguashu de xiaozhen’” [“Puxian”，“Mediterranean” and “A Town Planted with Papaya Trees”]，收錄於《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 雜誌篇》第二冊 *Rizhi shiqi taiwan wenyi pinglunji zazhi pian di er ce [A collection of Taiwanese Literary Criticism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art 2]*，黃英哲編(edited by Huang, Ying-Zhe)，頁278。臺南(Tainan)：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Kuojia Taiwan wenxueguan choubei chu)。

山田敬三(Yamada, Keizou)。1994。〈悲哀的浪漫主義者—論日據時期的龍瑛

- 宗〉“Beiai de langman zhuyi zhe: lun rijiu shiqi de long ying zong” [Sorrowful Romantics: on Long Yingzong in the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發表於「賴和及其同時代作家—日據時期臺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Laihe ji qi tongshidai zuojia :rijiu shiqi taiwan wenxue guoji xueshu hui yi) [presented at Laihe and His Contemporary Writers :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Taiwanese Literatur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清華大學中文系主辦(Qing hua da xue zhong wen xi) [sponsored b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singhua university]。1994/11/25-27。
- 王耀輝(Wang, Yao-Hui)。1991。〈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重挫—張文環和龍瑛宗的小說創作〉“Taiwan xin wenxue yundong de zhongcuo:Zhang WenHuan he Long YingZong de xiaoshuo chuanguo” [Defeat of Taiwan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 Novels Written by Zhang Wen-Huan and Long YingZong]。收錄於《臺灣文學史》上卷 *Taiwan wenxue shi shang juan*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Part 1], 劉登翰等編(edited by Liu, Deng-Han et al.) , 頁565—577。福州(Fuzhou): 海峽文藝(Haixia Wenyi)。
- 矢內原忠雄著(Yanaiharu, Tadao), 周憲文譯(translated by Zhou, Xian-Wen)。1987。《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Riben diguo zhuyi xia zhi Taiwan* [Taiwan under Japanese Imperialism]。臺北(Taipei): 帕米爾書店(Pamier shudian)。
- 光明靜夫著(Mitsuaki, Shizuo), 林郁芯譯(translated by Lin, Yu-Xin)。2006。〈就勢力抬頭的純文學的幻象而論〉“Jiu shili taitou de chun wenxue de huanxiang er lun” [So Far as the Illusion of Pure Literature is Concerned], 收錄於《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 雜誌篇》第一冊 *Rizhi shiqi taiwan wenyi pinglunji zazhi pian di yi ce* [A Collection of Taiwanese Literary Criticism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art 1], 黃英哲編(edited by Huang, Ying-Zhe), 頁143—147。臺南(Tainan): 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Kuojia Taiwan wenxueguan choubei chu)。
- 安東尼奧·葛蘭西著(Antonio Gramsci), 曹雷雨等譯(translated by Cao, Lei-Yu)。2000。《獄中札記》*Yu Zhong Za J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頁2。北京(Beijing): 中國社會科學(Zhongguo shehui kexue)。
- 巫永福著(Wu, Yong-Fu), 李駕英譯(translated by Li, Yuan-Ying)。1990(1933)。〈首與體〉“Shou yu ti” [Head and Body], 收錄於《翁鬧巫永福王昶雄合集》*Weng nao Wu yongfu Wang changxiong heji* [Weng Nao, Wu Yong-Fu and Wang Chang-Xiong's Collection], 張恆豪編(edited by Zhang, Heng-Hao), 頁176。臺北(Taipei): 前衛(QianWei)。
- 呂正惠(Lyu, Zheng-Hui)。2002。〈龍瑛宗小說中的小知識分子形象〉“Long YingZong xiao shuo zhong de xiao zhishi fenzi xingxiang” [The Image of the Little Intellectual in Long YingZong's Novels], 收錄於《殖民地的傷痕—臺灣文學問題》*Zhimindi de shanghen: taiwan wenxue wenti* [The Scars of the Colonies: the Problem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呂正惠著(written by Lyu,

Zheng-Hui)，頁17—29。臺北(Taipei)：人間(RenJian)。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會(Jindai riben sixiangshi yanjiuhui)著，李民譯(translated by Li, Min)。1992(1959)。《近代日本思想史》*Jindai riben sixiangshi [Modern Japa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北京(Beijing)：商務(ShangWu)。

吳婉萍(Wu, Wan-Ping)。2013。《殖民地臺灣的戀愛論傳入與接受—以《臺灣民報》和新文學為中心(1920-1937)》*Zhimindi Taiwan de lianailun chuanru yu jieshou—yi 《Taiwan Minbao》 he xinwenxue wei zhongxin [Introduc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 Theory of Love in Colonial Taiwan: Centered on Taiwan Minbao and New Literature]*。政治大學臺文所碩士論文(Zheng zhi da xue tai wen suo shuo shi lun wen) [M.A.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未出版(unpublished)。

柄谷行人著(Karatani, Kouzin)，趙京華譯(translated by Zhao, Jing-Hua)。2003(1993)。《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Riben xiandai wenxue de qi yua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北京(Beijing)：三聯書店(Joint Publishing)。

施淑(Shi, Shu)。2001。〈龍瑛宗文學思想初論〉“Long Ying Zong wenxue sixiang chulun” [Discussion on Long Ying Zong's Literary Thoughts]，收錄於《臺靜農先生百歲冥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Tai jing nong xiansheng baisui mingdan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Proceedings of the 100th Birthday Symposium of Mr. Tai Jing Nong]*，頁270。臺北(Taipei)：臺灣大學中文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aiwan university)。

——。2012。〈感覺世界—三〇年代臺灣另類小說〉“Ganjue shijie: sanshi niandai Taiwan linglei xiaoshuo” [The World of Feeling: Alternative Fiction from Taiwan in the 1930s]，收錄於《文學星圖》*Wenxue xingtu [The Star Map of Literature]*，施淑著(written by Shi, Shu)，頁80。臺北(Taipei)：人間(RenJian)。

翁鬧著(Weng, Nao)，魏廷朝譯(translated by Wei, Ting-Chao)。1990(1937)。〈天亮前的戀愛故事〉“Tian liangqian de lianai gushi” [Love Story before Dawn]，收錄於《翁鬧巫永福王昶雄合集》*Weng nao Wu Yongfu Wang Chang-Xiong's Collection*，張恆豪編(edited by Zhang, Heng-Hao)，頁113—137。臺北(Taipei)：人間(RenJian)。

清地ゆき子著(Kiyochi, Yukiko)，姚紅譯(translated by Yao, Hong)。2014。〈近代譯詞「戀愛」的成立及其意義的普及〉“Jindai yici lianai de chengli ji qi yiyi de puji”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Translated Word “Love”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Its Meaning]，《東亞觀念史集刊》*Dongya guannianshi jik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Asia]* 6: 278。

- 葉石濤(Ye, Shi-Tao)。1981。〈臺灣的鄉土文學〉“Taiwan de xiangtu wenxue” [Native Literature in Taiwan]。收錄於《臺灣鄉土作家論集》*Taiwan xiangtu zuojia lunji*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aiwan Native Writers]，葉石濤著 (written by Ye, Shi-Tao)，頁27—39。臺北(Taipei)：遠景(Yuan Jing)。
- 葉榮鐘(Ye, Rong-Zhong)。2000。《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Rijuxia taiwan zhengzhi shehui yundongsbi*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臺北(Taipei)：晨星(Chen Xing)。
- 郭天留(劉捷)(Guo, Tian-Liu [Liu, Jie])著，林曙光譯(translated by Lin, Shu-Guang)。2006(1935)。〈有關臺灣文學的備忘錄〉“Youguan taiwan wenxue de beiwanglu” [A memorandum on Taiwanese literature]，收錄於《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 雜誌篇》第一冊 *Rizhi shiqi taiwan wenyi pinglunji zazhi pian di yi ce* [A collection of Taiwanese Literary Criticism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art 1]，黃英哲編(edited by Huang, Ying-Zhe)，頁238—243。臺南(Tainan)：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Kuojia Taiwan wenxueguan choubei chu)。
- 陳崑樹(Chen, Kun-Shu)。1925。〈根本的婚姻革新論〉“Genben de hunyin gexin lun” [The fundamental revolution in marriage]，《臺灣青年》*Taiwan qingnian* [Taiwan's youth] 3(6): 5。
- 張我軍(Zhang, Wo-Jun)。1925/10/18。〈至上最高道德—戀愛〉“Zhishang zuigao daode: lianai” [Supreme Morality: Love]，《臺灣民報》*Taiwan minbao* [Taiwan Minbao] 75: 14。
- 黃琪椿(Huang, Qi-Chun)。2017。《龍瑛宗接受史與臺灣文學研究問題》*Long Yingzong jie shoushi yu taiwan wenxue yanjiu wenti* [The Reception History of Long YingZong and Taiwan Literature Research]。淡江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Kaohsiung shifan daxue boshi lunwen)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mkang University]，未出版(unpublished)。
- 。2019。〈史芬克斯如何成而為人？—戴國輝與龍瑛宗關於殖民地現代性主體的思考〉“Shifenkesi ruhe cheng er wei ren? Dai GuoHui yu Long YingZong guanyu zhimindi xian daixing zhuti de sikao” [How did Sphinx Become a Human? Thoughts of Gai GuoHui and Long YingZong on Subjects of Colonial Modernity]，發表於「2019年會文化研究第二十屆年會暨國際研討會——其餘的興起」(2019 Wenhua yanjiu nianhui ji guoji yantaohui——qiyu de xingqi) [presented at The 20th annual meeting a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ultural studies 2019—the Rest of the Rise]。文化研究學會、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主辦(Wenhua yanjiu xuehui、jiaotong daxue shehui yu wenhua yanjiusuo) [sponsored by 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d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e Studies, NCTU]，2019/3/09-10。

黃梅(Huang, Mei)。2015。《推敲『自我』—小說在18世紀的英國》*Tuiqiao ziwu: xiaoshuo zai 18 shiji de yingguo* [Examine the “Self” - Novel in 18th Century England]。北京(Beijing)：三聯書店(Joint Publishing)。

溫若含(Wen, Ruo-Han)。2000。《從啓蒙意識到創作轉折—日治時期新文學小說中的「戀愛」敘事研究(1920-1937)》*Cong qimeng yishi dao chuanguzuo zhuanzhe: rizhi shiqi xin wen xue xiaoshuo zhong de lianai xushi yanjiu(1920-1937)* [From Enlightenment Consciousness to Creation Transition -- A Study on the Narrative of “Love” in New Literary Novel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20-1937)]。政治大學臺文所碩士論文(Zhengzhi daxue taiwensuo shuoshi lunwen)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Chengchi University]，未出版(unpublished)。

楊遠著(Yang, Kui)，涂翠花譯(translated by Tu, Cui-Hua)。2006(1935)。〈臺灣文壇近況〉“Taiwan wentan jinkuangz”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aiwan's Literary Scene]，收錄於《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 雜誌篇》第一冊 *Rizhi shiqi taiwan wenyi pinglunji zazhi pian di yi ce* [A Collection of Taiwanese Literary Criticism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art 1]，黃英哲編(edited by Huang, Ying-Zhe)，頁287—292。臺南(Tainan)：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Kuojia Taiwan wenxueguan choubai chu)。

龍瑛宗著(Long, Ying-Zong)，張良澤譯(translated by Zhang, Liang-Ze)。1994(1937)。〈植有木瓜樹的小鎮〉“Zhi you muguashu de xiaozhen” [A Town with Papaya Trees]，收錄於《龍瑛宗集》*Long YingZong ji* [Long Yingzong's Collection]，張恆豪編(edited by Zhang, Heng-Hao)，頁13—72。臺北(Taipei)：前衛(Qian Wei)。

——，葉笛譯(translated by Ye, Di)。2006a(1937)。〈植有木瓜樹的小鎮〉“Zhi you muguashu de xiaozhen” [A Town with Papaya Trees]，收錄於《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1冊 小說集(1)》*Long YingZong quan ji zhongwenjuan xiaoshuo ji(1)* [Long YingZong collection Chinese volume 1 novels(1)]，陳萬益編(edited by Chen, Wan-Yi)，頁1—48。臺南(Tainan)：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Kuojia Taiwan wenxueguan choubai chu)。

——。2006b。〈怎麼樣也看不懂〉“Zenmeyang ye kanbudong” [How also don't understand]。收錄於《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7冊 隨筆集(2)》*Long YingZong quanji zhong wenjuan suibiji(2)* [Long YingZong collection Chinese volume 7 essays (2)]，陳萬益編(edited by Chen, Wan-Yi)，頁138—140。臺南(Tainan)：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Kuojia Taiwan wenxueguan choubai chu)。

——。2006c。〈我的第一篇小說〉“Wo de diyipian xiaoshuo” [My First Novel]。收錄於《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7冊 隨筆集(2)》*Long YingZong quanji zhong wenjuan suibiji(2)* [Long YingZong collection Chinese volume 7 essays (2)]，陳萬益編(edited by Chen, Wan-Yi)，頁173。臺南(Tainan)：國家臺灣文

學館籌備處(Kuojia Taiwan wenxueguan choubei chu)。

——。陳千武譯(translated by Chen, Qian-Wu)。2006。〈宵月〉“Xiao yue” [Evening moon]。收錄於《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1冊 小說集(1)》*Long YingZong quan ji zhongwenjuan xiaoshuo ji(1)* [*Long YingZong collection Chinese volume1 novels(1)*]，陳萬益編(edited by Chen, Wan-Yi)，頁1—48。臺南(Tainan)：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Kuojia Taiwan wenxueguan choubei chu)。

蘇敏逸(Su, Min-Yi)。2007。《社會整體性觀念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生和形成》*She hui zhengtixing guannian yu zhongguo xiandai zhangpian xiaoshuo de fasheng he xingcheng* [*The concept of social integrity and the occurrence and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novels*]。臺北(Taipei)：秀威(Xiu Wei)。

羅成純(Luo, Cheng-Chun)。1991。〈龍瑛宗研究〉“Long Ying-Zong yanjiu” [*Long YingZong Research*]。收錄於《龍瑛宗集》*Long YingZongji* [*Long Yingzong's Collection*]，張恆豪編(edited by Zhang, Heng-Hao)，頁233—326。臺北(Taipei)：前衛(Qian Wei)。

二、日文書目

三木清。1971(1933)。〈不安の思想とその超克〉。收錄於《現代日本文學論爭史》下卷，平野謙等編，頁9—18。東京：未來社。

川崎淡。1993。〈日本におけるレフ・シェストフ〉，《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 文学・芸術学編》通號三十九期，頁55—65。

内田義彦。1968。《日本資本主義の思想像》。東京：岩波書店。

竹内洋。2004。《教養主義の没落》。東京：中央公論。

平岡敏夫、東郷克美主編。1987。《日本近代文學史概説 近代編》。東京：有精堂。

松本昌子。1982。〈日本におけるドストエフスキー受容と「研究」〉，《日本の神學》第二十一期，頁126—147。

松本和也。2011。〈昭和一〇年前後における新人『作品』：石川淳を手がかりに〉，《信州大學人文科学論集（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編）》四十五期，頁89—109。

和泉司。2012。《日本統治期臺灣と帝國の〈文壇〉—〈文學懸賞〉がつくる〈日本語文學〉》。東京：ひつじ書房。

秦仲彌（浜田隼雄）。1937/04/06。〈文藝月評『パパエヤのある街』上〉，《臺灣日報》。

追風。1922。〈彼女は何處へ？惱める若き姉妹へ〉，《臺灣》三卷七號，頁59。

曾根博義。1990。〈戦前・戦中の文學—昭和8年から敗戦まで〉。収録於《昭和文學史全集別卷》，磯田光一等著，頁325—400。東京：小學館。

奥野健男。1999。《日本文學史：近代から現代へ》。東京：中央公論。

楊杏庭。1935。〈無限否定と創作性—ベルグリン、ハイデッガ、シエストフ〉，《臺灣文藝》二卷六號，頁1—8。